



# 財團法人凱達格蘭基金會 新台灣國策智庫通訊

第 130 期

2024 年 03 月

- 日本自民黨「派閥政治」的終結？\_\_\_\_\_ 2
- 從「台積熊本廠」變成「熊本日積電」的國安新課題\_\_\_\_\_ 4
- 展望賴清德時代的台日關係\_\_\_\_\_ 6
- 國會改革怎麼改\_\_\_\_\_ 8

## 編者的話

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楊鈞池教授研究，日本去年（2023 年）12 月爆發政治獻金不法挪用案件，此次政治風暴，即是涉及派閥以及所屬成員之間政治獻金募款與分配問題。從過去的經驗來觀察，自民黨內部的權力運作，也就是總裁競選時所強調「數字的力量」（派閥所屬成員的數量多寡），成為派閥存在之「必要的惡」。然而，派閥運作可能隱藏政治運作的不透明度，正如本次掀起的政治獻金不法挪用之風暴，如果沒有徹底的檢討與改革，還是有可能讓自民黨再次被選民放棄而失去執政權。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林岱緯助理教授分析，台積電赴日設廠符合合理性的決策，除了日本職場重視專注和忠誠的工作文化，有助於日籍員工融入台積電；日本在半導體設備以及特用化學更是世界領導地位，將可以和晶圓代工廠連成一線；另外，豐田、索尼等日本代表性企業的參股，也代表日本商界和社會的支持與投入，就此補上借助台積電來建構日本半導體生態系的最後一塊拼圖。這次透過台積電的海外設廠，大大提升台灣國際能見度，也擴散台灣科技和經濟影響力。為確保長遠國家安全，仍有一些隱憂需要注意。

新台灣國策智庫外交研究小組「展望賴清德時代的台日關係」圓桌論壇會議討論，台灣總統選舉可以看成是選民對兩岸關係表

態，台灣人民大致是以台灣海峽的和平穩定為前提；台灣有事等於日本有事，這句話有很多不同的解釋空間，日本與台灣關係非常好是事實，日本國民對台灣感情很好，對中國的態度則相反；台日還有發展兩國關係的空間，例如安全對話制度性、組織性的關係可以更緊密；台積電設廠被稱為黑船來了，為日本帶來好機會好契機，代表實際交流、實質關係的重要，有利於提升、建立制度關係。

2024 年 3 月 15 日新台灣國策智庫司法與法制研究小組「國會改革怎麼改」圓桌論壇會議評論，國會改革主張雖然並非全無道理，國會改革的提議卻可能製造更多問題與困難，國會的全面改革就是要直接走向三權，否則就衍生更多問題，例如國會調查權的擴張，如果立法委員與司法部門的檢察意見不同，就會發生難以化解的憲政危機；國會第一大黨的正當性也出現矛盾，因為民進黨的總得票率明顯高過國民黨，國民黨的國會改革主張是否有正當性？這樣的國會選舉制度有沒有代表性？監察權如果廢掉就不是五權憲法，立法院爭取監察權、調查權，會造成「廢組織、不廢其權」的結果。

## 日本自民黨「派閥政治」的終結？

楊鈞池

國立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教授

自從去年（2023 年）12 月爆發政治獻金不法挪用案件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以及執政的自民黨一直陷入「政治不信任」的陰霾，岸田內閣的民調支持度持續低盪，日本放送協會（NHK）2024 年 3 月 11 日公佈的民調，岸田內閣的支持率只有 25%，不支持率卻有 57%；至於自民黨的支持率也只有 28.6%。日本讀賣新聞 2024 年 2 月公佈的民調結果，岸田內閣支持率為 24%，連續四個月民調結果皆顯示岸田內閣陷人民調低於 30% 的「危險水域」，至於自民黨的支持率也只有 24%，是自民黨從 2012 年恢復執政後的最低紀錄。

無論是 NHK 或讀賣新聞的報導，民眾對岸田政權與自民黨處理政治獻金募款餐會問題的因應措施「非常不滿」，無助於選民對自民黨或岸田政權「恢復信賴」。

自民黨或岸田首相此次對募款餐會經費不法挪用醜聞的因應措施，最主要的是禁止繼續或創建新的「派閥」，也就是過去自民黨在面對政治獻金醜聞案時經常採用「解散派閥」的策略。自民黨目前已經有岸田首相所屬的岸田派，以及最大的安倍派與二階派、森山派先後宣佈解散，至於第二大派閥麻生派以及第三大派閥茂木派繼續維持。自民黨內部無法達成改革共識，似乎也暗示自民黨企圖使用「解散派閥」來緩和國民的疑慮，此次很難說服民眾。更何況，自民黨過去曾

有三次喊出「解散派閥」，可是，自民黨派閥總是有辦法恢復活動。

自民黨的派閥，具有三個重要的功能，分別是，提供經費或其他選舉資源給予所屬成員；內閣與政黨職務的提名或分配；以及政策研究。更值得注意的是，派閥及其成員透過這三種活動，最終目的是希望派閥領袖可以成為自民黨的總裁以及內閣總理大臣。

此次政治風暴，即是涉及派閥以及所屬成員之間政治獻金募款與分配問題。上一次爆發類似大規模的政治獻金醜聞案，可以追溯到 1988 年瑞克魯特事件以及 1992 年東京佐川急便事件，當時日本國民大力批判「金權政治」，竹下登首相因為瑞克魯特事件而辭職下台，自民黨在 1993 年終於失去執政權；1993 年上台的細川（護熙）內閣高舉「政治改革」旗幟，1994 年日本國會通過一系列政治改革法案，其中最矚目的法案是眾議員選舉制度的變遷、政治資金規正法的修正以及政黨補助制度的設立。當時候許多日本學者或輿論認為，這些政治改革法案有助於改善「政治與金錢」之間的不正當關係。

根據日本總務省的資料顯示，日本政黨在 2024 年預期獲得「政黨交付金」（政黨補助費用）約 315 億日圓，自民黨分配到 160 億日圓，最大反對黨立憲民主黨只有 68 億日

圓。至於合法且公開的政治獻金，日本政黨在 2022 年政治獻金的收入超過 1067 億日圓，自民黨政治獻金的收入超過 248 億日圓。自民黨既然可以獲得高額且合法的政黨補助與政治獻金，為何自民黨的國會議員或派閥還要募集或隱藏其他管道的政治獻金？

最關鍵的因素在於日本國會議員的選舉活動經費以及平常經營選區的事物支出實在很龐大，導致國會議員與派閥之間的關係，並沒有因為選舉制度改革以及其他政治改革法案的通過，出現實質性的變遷。也就是說，個別的國會議員仍然依賴來自派閥提供的經費分配，至於那些想要爭取自民黨總裁職務的派閥領袖則透過這些政治獻金的分配來換取派閥成員在總裁選舉的支持。

自民黨 1955 年成立的時候，黨內有「8 個師團」（8 個派閥）的說法，當時的自由黨

與民主黨本身也是派閥的結合；自民黨的成立是基於「保守合同」的理由，以這「8 個派閥」為核心的派閥結盟體。自民黨成立至今，1963 年池田勇人首相時，自民黨的組織調查會一度提出解散派閥，卻沒有真正的落實；1977 年福田赳夫首相曾經解散派閥，1978 年大平正芳首相因為派閥復活而當選；1993 年自民黨下台後也一度解散派閥，甚至關閉派閥事務所，1998 年小淵惠三當選首相後，派閥又恢復運作。

從過去的經驗來觀察，自民黨內部的權力運作，也就是總裁競選時所強調「數字的力量」（派閥所屬成員的數量多寡），成為派閥存在之「必要的惡」。然而，派閥運作可能隱藏政治運作的不透明度，正如本次掀起的政治獻金不法挪用之風暴，如果沒有徹底的檢討與改革，還是有可能讓自民黨再次被選民放棄而失去執政權。BT



# 從「台積電熊本廠」變成「熊本日積電」的國安新課題

林岱緯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2024 年 2 月 24 日台積電熊本廠開幕，台日政經要角雲集，外媒也爭相報導，瞬間提升台灣的國際能見度。本文將從風險意識的觀點，點出在這個高光時刻過後，台灣國家安全的潛在隱憂。

## 一、歷史脈絡

儘管此次台積電熊本廠開幕備受矚目，但事實上，這並非台日半導體首次合作。在 2000 年時，晶圓代工二哥聯電曾聯手日立（Hitachi）在日本設廠 Trecenti，聯電希望藉由聯手日立在半導體設備的基礎，投入十二吋晶圓代工、縮小與龍頭台積電的差距；而日立則是希望學習聯電的代工經驗，領頭重建日本的半導體產業。然而聯電和日立當年看似互蒙其利的攜手攻頂，兩年後以破局收場，聯電無法如願縮小差距，日立也無力重振日本半導體產業。

二十三年後，台日再啟重量級的半導體合作，以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為主體，日本重量級會社豐田汽車和索尼（SONY）參股，熊本一廠先投入成熟製程，後續再設新廠則可能跨入先進製程。

當然，前後兩次台日半導體合作，有著難以比擬的外部環境結構差異。二十多年前的世界，全球化的專業分工正盛，研發、製造、消費的上

中下游是採取各取所需、各擅所長的跨國整合，不符合成本效益的海外設廠自當難以成功；然而，近年興起的保守主義和地緣政治風險，徹底裂解全球化的基盤，催生短鏈和在地製造以確保晶片安全，海外設廠策略除了成本效益外，更多了一層政治思考。

## 二、台日半導體聯盟

熊本一廠比起美國亞利桑那廠可謂是後發先至，展現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行動力和決心，而熊本一廠取名為日本先進半導體製造（Japan Advanced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JASM），也顯示日本想在全球晶片爭奪戰中找尋新契機的雄心壯志，透過台日半導體聯盟，短期來看至少要達到「台灣有事，晶片沒事」的境界，確保日本汽車產業所需晶片供應無虞，而長遠目標更是想替代台灣成為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中「低風險、高韌性」的供應者。

再換從台積電的角度來思考日本設廠案，比起亞利桑那廠，赴日設廠似乎更是符合理性的決策，除了日本職場重視專注和忠誠的工作文化，有助於日籍員工融入台積電；日本在半導體設備以及特用化學更是世界領導地位，將可以和晶圓代工廠連成一線；另外，豐田、索尼等日本代表性企業的參股，也代表日本商界和社會的支持與投入，就此補上借助台積電來建構日本半導體生

態系的最後一塊拼圖。

### 三、矽島的隱憂

這次透過台積電的海外設廠，大大提升台灣國際能見度，也擴散台灣科技和經濟影響力。為確保長遠國家安全，仍有以下三面向隱憂需要注意：

#### 1、國防隱憂

當前的全球晶片爭奪戰，是「台灣有事，晶片有事」的局面，因此，撇開島鏈的軍事重要性不談，至少為了確保經濟運行，美國仍須盡其所能維護台海穩定。但在日本廠（甚至美國廠、德國廠）陸續到位後，未來極有可能變成「台灣有事，晶片沒事」，尤其在美國默許的情境下，日本有可能成為半導體供應鏈中的「台灣替代」。一旦如此，長遠來看，各國對於維持台海穩定所願意投入的防衛資源和成本勢必逐漸降低，形成台灣國防安全的隱憂。


#### 2、經濟隱憂

隨著熊本廠開幕以及 AI 應用需求增加，近期台積電單一公司在台灣股市的市值已逾三成，對此，Google 台灣前董事總經理簡立峰也示

警，產業過度集中將是另外一種危機。尤其台灣在半導體的優勢，遲遲未能擴散到其他領域，逐漸錯失百工百業應用晶片邁向智慧化的先機，而半導體產業過度集中、卻又無法成為帶領其他產業數位轉型的火車頭，護國神山無法擴展成護國群山，這是台灣經濟發展的隱憂。

#### 3、社會隱憂

最後，台灣在追求政治轉型正義的過程，忽略了社會轉型的不公不義。政府為了發展半導體產業所投入的國家資源，造就了今天的矽島實力，但半導體的成功果實卻沒有辦法讓全民共享。過去在草創起步時期，政府提供補助與優惠措施當屬合理，但隨著半導體產業已經深耕茁壯、甚至傲視全球，國內產業不僅已經發展失衡，政府卻想再挹注國家資源在半導體領先群，忽視科技貧民和數位弱勢更需要國家力量照顧，等同將讓全民變成科技矽島的局外人，這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隱憂。

2024 年 2 月 24 日，是台積電和台灣的高光時刻，對於長遠的三項國安隱憂，應及早思考對策。莫讓台積電海外設廠的成功，反而弱化台灣的地位與角色、阻礙台灣社會的公正轉型。

## 展望賴清德時代的台日關係

編輯部

編按：本文係新台灣國策智庫 2024 年 3 月 1 日召開外交研究小組圓桌論壇會議「展望賴清德時代的台日關係」之紀錄摘要。

影響賴清德時代台日關係的因素是什麼？新總統即將上任，台日關係非常重要，過去專家們所關心的議題，在新時代有新的意義，如何展望未來是今天的問題意識；回顧過去的路徑很重要，因為會影響以後的發展；現在台美日中四角關係之下台日的連動與互動，將影響以後台日關係的走向；思考台日關係時，中國因素最為重要，因台日都要看北京臉色；台灣對日本的期待特別多，經常一廂情願要求日本，但是日本必須思考 1972 年體制，也就是一個中國的承諾，台日是實質性、事務性的立場與關係，短期內顯然無法有明顯改變，可以做的只是摸索雙方關係的範圍與邊界。

規範台日關係的是多邊的美日台中連動關係，包括中美、台美、兩岸、美日、中日等，這幾組關係的連動與拉扯，就是當下影響台日關係的大環境；台日關係首先受中日關係影響，日本在安保議題上全面倒向美國，安倍政府以後安保的重心移動，不再侷限北韓、韓日關係的牽制，而是轉向面對中國的威脅，連帶使台灣有事的熱度飆升，但主要的動力不是因為台灣議題，而是西南諸島安全問題，特別是先島群島的軍事化，日本必須預防中國奪島；雖然戰後早年就有遠東條款，直到 2021 美日 2+2 會談才初次明確提到台灣問題，學界輿論界開始大談台灣有事，但日本政府可以做的其實很有限，因為台日沒有正式邦交，依法不可能進行正式安全合作，官方交流對話也受到嚴厲限制，只能透過二軌推動研究交流；1972、1978 中日的協定是很嚴格的限制；台

日安全對話很難建立，非正式的對話通常無功而返，2018 年 3 月 1 日產經新聞刊登蔡總統講話，提到台日安全對話，意思是制度化而不是零星的對話，這種常態性對話互訪值得建立；台日在李登輝總統時期有對話可惜無延續，陳前總統的對日工作小組也有其功能，蔡總統雖然有些進展可惜沒有日本專家，國安會沒有延續長期性穩定的執行對話人力，早年李登輝時代的專家架構值得恢復。

日本最在意的還是台海兩岸關係，重要的議題有台海軍事均衡、中國大陸國內情勢的穩定、中國的經濟政策與表現、台灣的兩岸關係立場、中美關係的穩定等；兩岸政策是不是言必行、行必果，以及去年拜習會的承諾必須高度重視；習近平表示沒有武統的計畫，以前習近平也曾經承諾南海的非軍事化，但他的諾言卻完全落空；習近平的發言當然很重要，中國威脅還是不能輕忽，但經濟波動以及軍隊穩定狀況顯示中國沒有準備好，中國在軍事力量、物質基礎以及心理的準備都還不夠，我們可以說解放軍目前沒有具體攻台準備；TRUMP 2.0 比起以前的風險更大，可能使全球衝突威脅捲土重來，萬一東亞戰爭爆發就是世界大混戰；我們需要理性對應危機，金廈（翻船）危機不應該升高，冷靜的回應處理很明智。

中國對日戰略是邊打邊拉、鬥而不破，美日、中日關係都受到美中關係所影響，最近的 2023 拜習會的影響就很大，拜習會的影響在於釋

出明確信號，中方說是對台灣危機達成掌控共識，將會影響日本的判斷與決策，日本很關心中美的思考與關係發展，觀察美國如何認定改變現狀，研判美國將會如何採取激烈反應；中方的機艦迫近或跨過中線，侵入台灣、日本領海或禁止水域，美國會以何種方式認定是改變現狀，日本對於美國的反應與佈局都會認真思考。只要台海危機沒有消失，日本的台灣熱不會消失，總統大選隔日日本古屋圭司會長與大橋光夫會長就來拜會，表示對台灣的重視與優先；天皇生日酒會，台灣總統新舊任都到，表示對日本推崇與善意；兩岸風雲是不是影響日商的投資經營，日本企業在商言商有他們自己的立場，我們可以多讓日本了解台灣的想法。

台灣政府是不是得到美國的信賴非常關鍵，台灣應該更加重視美國關係，蔡總統得到美國很大的信任，將來賴總統應會順利延續，台灣日本的信賴關係也會延續；釣魚台問題不會影響台日關係，即使馬前總統也刻意沈寂下來，馬英九雖然有反日標籤與情緒，我們卻不應忽視他的努力，台日斷交以來雙方簽署的備忘錄，有 80% 是馬總統任內完成的，相信賴總統會比馬做得更好。台灣加入 CPTPP 將遙遙無期，日本雖支持台灣，但力度仍然不夠，中國的反對是一大障礙，只要有一國反對就會擱淺，日本是有可能更盡力幫助，總體的機會不大但值得期待；蔡政府太慢排除障礙，福島食品問題拖到 2022 才解決，時間耽擱太久影響雙邊關係進展；FTA 是緊密的經濟關係，台日沒有邦交不易推動；EPA 推動「台日經濟一體化」比較實際，對日本的關係是經濟

比較可行，「台日經濟一體化」值得努力推動，我們可以更加積極主動，不可完全依賴日本來做。

台灣總統選舉可以看成是選民對兩岸關係表態，台灣人民大致是以台灣海峽的和平穩定為前提；台灣有事等於日本有事，這句話有很多不同的解釋空間，日本與台灣關係非常好是事實，日本國民對台灣感情很好，對中國的態度則相反；台日還有發展兩國關係的空間，例如安全對話制度性、組織性的關係可以更緊密；台積電設廠被稱為黑船來了，為日本帶來好機會好契機，代表實際交流、實質關係的重要，有利於提升、建立制度關係；CPTPP 是共識決，所有參與國家都同意才有機會，台日可以合作設立方案對各國說服，但中國也會說服他國抗議阻擾；台積電的實際行動與投資充滿象徵，雙方應該可以更加廣泛促進對話，但日本人還是會關心、在意兩岸關係。台灣有事日本有事，表示日本對台灣的重視；岸田首相沒有親口說出，麻生太郎比安倍更早提出台灣有事，岸田不能說但會做，因為防衛部署就在應對中國，日本部署強化西南諸島防衛，過去沒有軍隊駐守的現在派有自衛隊，整個連動對中有威嚇效果，連同建設中的 130 個彈藥庫，已經接近日本備戰的極限，日本不可能派兵支援台灣；沖繩的聲音在日本只有些微影響，沖繩居民的獨特立場值得理解，反戰反美來自獨特歷史經驗，二戰時沖繩犧牲四分之一人口，巨大的歷史傷痕不希望再被捲入戰爭，很可惜玉城丹尼知事訪台時，沒有機會說明沖繩人的感受與想法。BT



## 國會改革怎麼改

編輯部

編按：本文係新台灣國策智庫 2024 年 3 月 15 日召開司法與法制研究小組圓桌論壇會議「國會改革怎麼改」之紀錄摘要。

以往國會改革的呼聲很多，多數以無疾而終收場，現在國民黨重回多數黨角色，立法院生態的改變，許多怨氣跟著老問題一起爆發出來；國民黨在 3 月提出「國會改革五法」，引起民進黨團強烈回應，批評其擴權並主張應該要先召開公聽會；立法院針對國會的重大改革，事關憲政體制與國會效能，在表決前應有的周詳審議過程，建立社會共識與正當性有其必要。

國會改革五法包括國情報告、藐視國會罪、調查及聽證權與人事同意權等，整個重點是「聽證權」與「調查權」，可能造成侵犯司法權與人權；在國會會期中當然可以質詢，即使國會休會期間也不是問題，例如美國就可以休會任命，川普政府國家安全顧問波頓的任命，就是在休會期間任命的例子；調查權的問題不是「有沒有」的問題，是「權限範圍怎麼行使」的問題，依照大法官會議解釋，監察院現在已經有調閱權，問題在於機密文件能不能調閱，機密文件能不能拆封的問題，法官有調查與拆封的權力，其他人員是不是具有法官的權限則有疑義。

立法者雖然表示調閱權的權限不是問題，事實上調閱權的發動還有很多爭議，例如監察院可以調閱文件，但不能調查私人文件資料，調查範圍如果不只公務機關，調查要以什麼方式、怎麼進行？國會要約詢私人或調閱私人文件並沒有正當性，因為欠缺法律授權與依據；議長的提案

權應該可以成立，因為議長原本就可以有立場；委員會本來就可以行政調查，司法調查可能涉及越權爭議，調查權、調閱權是不是類似歐洲的護民官設計，是不是只要不干預司法案件即可？對官員與人民的調查是不是都一樣？國會議長選舉制度問題，外國的議長選舉很少像台灣爭議這麼大，實際上記名與不記名投票的差異性不大；人事同意權在美國有參眾議員的監督制衡，媒體也可以有很大的監督作用。

有關國會人事同意權的行使，行使的方式是有修改的空間，例如大法官提名審查過程顯得過於倉促草率；立法院調查權的行使，應該不限於文件調閱權，備詢與質詢的進行，依照大法官會議 461 號解釋，政府人員都有義務被質詢，所以質詢應該是資訊獲得的權利，備詢是不是實質上的質詢仍存疑。國情報告有其合理性，牽涉行政院長職權的劃分，行政院長已經有施政報告，總統的報告內容應該是國家大政，以國防外交安全事務範圍為原則。

「藐視國會」在美國相當慎重，重點在於藐視國會的行為樣態如何認定，例如不實陳述的成立與處置為何？「反質詢」似乎也不是問題，應該回到質詢的本意，也就是回答的義務為何？因為目前的質詢是以一問一答進行，如果有亂問亂答的爭議，此時主席（召委）就可以介入，不然詢答雙方的離題「鬥嘴」如何化解？即問即答的質詢可以是長篇大論的演講嗎？已經言詞辯論

過的問題還有必要「調查」嗎？這些議事問題應該由會議主席來介入較為恰當，院長主持的能力與立場才是關鍵；質詢台更不應成為問題，目前雙北議會設有備詢台，但其他縣市未必都有備詢台，一樣可以在座位上起立作答。

台灣國家的特殊性造成「人」的問題，也就是國家安全有關事務與政策，不適宜也不敢信任交付職權予某些人，因為「人」的職權會產生國家關聯性；五權憲法形式要達成實質三權有其限制，立法院的總統報告與國會調查權，可能成為無法管制的國會怪獸，涉入絕對不可超越的司法領域；有人提出藐視國會罪，認為藐視國會就是犯罪行為，我國刑法第二篇分則以國家法益為核心，國家社會個人的法益不同，前三章包括內亂罪、外患罪、妨害國交罪是國家存在法益，第四章瀆職罪、第五章妨害公務罪是行政作為，刑法只有保護行政與司法兩權，台灣的制度不適合美國的藐視罪，很難想像藐視國會罪的存在；我國在應然面與實然面都有一致性的行政期待，如此看守內閣的說法就不適合，因為沒有行政改變的期待，就沒有看守內閣的問題；內閣制有原則與例外的原則，不分區立委席次使小黨有機會發聲，選區選出的立委有更強大的民意與執政正當性。

總統國情咨文或「國情報告」也不是沒有前例，早在李登輝總統時就有國民大會國情報告，但非一問一答而是綜合回答；總統報告與回答事關權責設計，要探討的是一問一答或綜合回答，要求總統一問一答並不實際；詢答在地方政府有其必要，但總統制的總統與立院實際上是各自對選民負責，日本國的國會是最高權力機關，但也沒有所謂上對下或下對上問題，總統制的美國總統權力最大，還是經常需要與國會協商妥協。現

行的委員會中心主義，召委擁有排案權，其影響簡直比院長還大，因為可能決定議案案件的產生與否；委員資深制的落實也存在疑義，立法助理的培訓非常重要，美國國會幕僚輔助能力很強，所以議員問政表現很強，議員的選民服務也很強。

表演政治是國會殿堂的一大問題，立委的專業化必須以委員會為主，立委出席率也不是越多越好，法案提議也不是越多越好，還要看提案有沒有新意，當然這些問題與憲政制度有關，我國憲法是拼裝車具有各國特色，也容易出現各國的各種問題。總統做為實質領袖的份量越來越重，但是依照憲法，最高行政首長是行政院長，似乎有憲政錯亂的現象；國會頻道的收視率很高，立法院原來的國會質詢像是英國的國會辯論，也就是統問統答的方式，但是在大量省議員進入立法院後，逐漸形成一問一答、不問不答的形式主義情況；國會調查權在內閣制國家很自然，調查權經大法官解釋已經確立，差別只在於強制權的有無，監察權沒有強制處分權，行政部門的促轉會、國家人權委員會也沒有，藐視國會罪恐怕也不適合強制權。

國會改革主張雖然並非全無道理，國會改革的提議卻可能製造更多問題與困難，國會的全面改革就是要直接走向三權，否則就衍生更多問題，例如國會調查權的擴張，如果立法委員與司法部門的檢察意見不同，就會發生難以化解的憲政危機；國會第一大黨的正當性也出現矛盾，因為民進黨的總得票率明顯高過國民黨，國民黨的國會改革主張是否有正當性？這樣的國會選舉制度有沒有代表性？監察權如果廢掉就不是五權憲法，立法院爭取監察權、調查權，會造成「廢組織、不廢其權」的結果。BT



財團法人凱達格蘭基金會  
新台灣國策智庫通訊

---

發行人：陳亭妃

總編輯：李明峻

副總編輯：張人傑、陳致中

執行編輯：林彥宏、蘇世岳